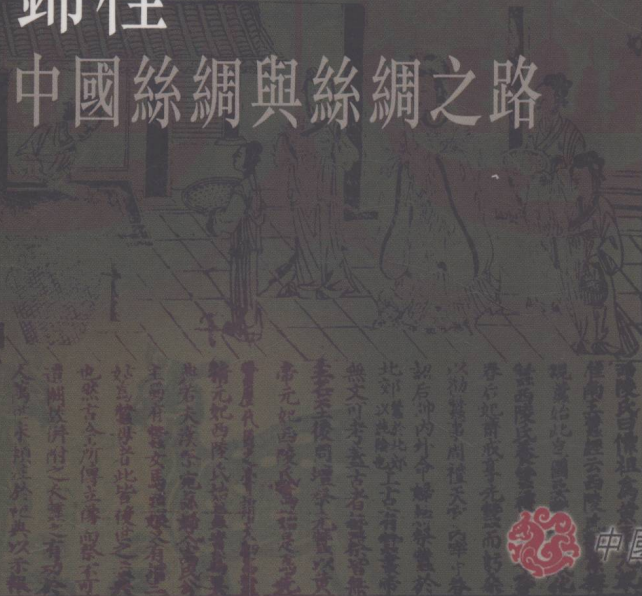


# 錦程

## 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



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

趙豐 著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錦程

## 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

趙豐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本社已盡最大努力，確認圖片之作者或版權持有人，並作出轉載申請。唯部分圖片年份久遠，未能確認或聯絡作者或原出版社。如作者或版權持有人發現書中之圖片版權為其擁有，懇請與本社聯絡，本社當立即補辦申請手續。

©2012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http://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mailto:upress@cityu.edu.hk)

©2012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ese Silk and the Silk Roa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200-2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http://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mailto: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 總序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幾乎土崩瓦解，經歷了充滿創傷與痛苦經驗的轉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生活體驗，也隨着西潮的波濤，在巨浪滔天的環境中載浮載沉。晚清的自強與改革，其實是自救與圖存，清清楚楚認識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先是軍事的改革，「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再來是經濟的、政治制度的、社會結構的改變，前腳還未離開，後腳又到。自強運動不靈，便有戊戌維新；維新失敗，便有辛亥革命；革命推翻帝制，卻帶來了軍閥割據，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起文化階層的意識變動，之後更深入到民間，調動全民的參與。國民革命繼之以共產革命，革命之不足，還要「繼續革命」，一直革到文化大革命，文化砸爛，斯文掃地，到了革無可革之時，這才否極泰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文化依存於人的生活。當一個民族經歷着百多年的生死掙扎，一心只想着救亡圖存，其文化心態當然也就很難平衡，總是大起大落，大取大捨，矯枉過正。到了21世紀，大多數人都認識向西方傳統學習的必要，但激進者卻一定要喊出「全盤西化」；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保存固有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但國粹派卻一定要提倡「尊孔讀經」；大多數人都了解應該汲取多元中外文化傳統的滋養，但在文化論壇上卻仍能聽到「打倒孔家店」、「崇洋媚外」、「推翻吃人的禮教」、「痛打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這樣的充滿激情與暴力的偏執口號，交叉喊話，來回挑釁。

從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角度來看，近兩個世紀的環境不但惡劣，而且充滿了摧殘生機的陷坑與風暴。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心靈，也就難免畸形，充滿了戾氣與不平衡的心態，以為「除舊佈新」、「破舊立新」可以開創美好的未來。更以口誅筆伐的手段來排除異己，建立輿論權威。不僅一般社會中瀰漫着「推倒重來」的文化態度，連學術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甚至配合政治運動，實踐「矯枉必須過正」的荒謬理論。

當追求知識的人不能與現實利益保持距離，不能以長遠的歷史文化作為認識的座標，只幻想着當前的參與與投身，希望通過批判與改造來創造文化，以達成士大夫「先憂後樂」或「知識分子良心」的願望，他們就忘了人類文明累積的「知識」為甚麼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把文化遺產當作實用工具，企圖謀求個人名利，固然是下焉者；企圖謀求國族復興之道，把文化轉為政治與經濟運作的附庸，也不見得是人類的長遠之福。現在的社會太着眼於功利、太講究價格與利潤、太迷信當前的實效，完全忽視了生活的品質、人文與大自然的協調、生命的快樂與幸福。我們看到許多政府、大財團與跨國公司都在經營文化事業，表面上是重視文化與生活的關係，也算好事，另一方面卻以麥當勞與迪士尼的經營理念使文化庸俗化，變為賺錢的工具，則有損文化的長遠發展，同時阻礙一般人文化修養的提升，讓人沉迷於單調無聊卻能暫時刺激感官的活動。

近來我出版了一本文史哲藝隨筆集，以《高尚的快樂》作為書名。這裏摘錄兩段，說明我所謂的「高尚的快樂」是甚麼：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 (Demokritos) 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寫過很多關於藝術的著作，可惜大都散佚了。幸存的殘篇裏有一段話，充滿了智慧：

「不應該追求一切種類的快樂，應該只追求高尚的快樂。」

甚麼是高尚的快樂？德謨克里特沒說。或許他說過，卻散佚了；或許他從未具體討論過，因為他認為那不用多說，是人人都知道的。不管他說過沒有，這段話還是充滿了質樸的智慧，因為明確指出了，快樂有等差，並不是所有的快樂都高尚。

問題還是回到：甚麼是高尚的快樂？也許18世紀的康德在具體分析美的藝術時，提供了解釋。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把藝術分成兩種：為了感官享受的「快適的藝術」，與提供反省快樂的「美的藝術」。前者「單純以享受做它的目的……叫人忘懷於時間的流逝」；後者則「是一種意境……雖然沒有目的，它仍然具有促進心靈諸力的陶冶以達到社會性的傳達作用。」（宗白華譯）

也就是說，高尚的快樂是要超乎感官享受的，絕不能只停留在康德所謂的「當前的歡娛消遣」。

人類創造文明，追求文化與藝術的發展與提升，使自身的性靈更美好、更高尚，是人異於禽獸、作為萬物之靈的展現。每一個文明的高度發展，雖然牽扯到各種錯綜複雜的階級與人際衝突與鬥爭，但放在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看，總體的累積卻明確顯示，人類企圖藉着文化的創新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中國文化也不例外，累積了五千年以上的經驗，其中有成功的愉悅，也有失敗的痛苦，有造福人群的績效，也有殘害蒼生的教訓，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借鑒，更是我們創造明天最寶貴、最實在的資源。只有充份掌握了自己身邊的文化資源，我

們才會了解為甚麼社會的發展要均衡，為甚麼人際關係要和諧，為甚麼應該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為甚麼追求經濟效益不能唯利是圖。

香港城市大學於1998年開始創立中國文化中心，在校長張信剛教授的策劃下，規定全校學生必修六個學分中國文化課程，以奠定大學生最基本的人文素質。在全校各院系群策群力的支持之下，順利推展了一系列教學新猷，如網路教學、中國文化與藝術示範講座、文化古蹟考察等等。為了舉辦文化講座，我們盡量網羅海內外的碩學名儒，到城市大學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與大學生探討各個學術領域的新知。進行了四年，成績斐然，而且累積了令人羨艷的演講材料。

這些從不同學術領域探討中國文化的講辭，凝聚了講者幾十年研探的心得，用淺易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不但是大學生踏上學術道路之門徑，也是一般人了解中國文化的方便法門。有鑒於此，我們徵得講者的同意，又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由本校的大學出版社推出這一套「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盼能為中國文化的創新盡點綿薄之力。

這套系列從構想、企劃，到印成白紙黑字，貢獻最大的是中國文化中心的老師及城大出版社的同事。我還要特別感謝張信剛校長、高彥鳴副校長及黃玉山副校長的鼎力支持，更感謝出版社鄺子器社長的投入及范家偉博士孜孜不倦的協助。中國有句俗話，「眾人捧柴火焰高」，也就是集思廣益、集腋成裘的意思，但表達的感覺要積極進取得多，充滿了樂觀向上、欣欣向榮的心情。我們推出這套「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的過程，也充份體會了這種群策群力、合作無間的精神，與城市大學的校訓「敬業樂群」（語出《禮記·學記》），倒是若合符節。

既然提到了《禮記·學記》，讓我在此引幾段經典，與同事、同學，及所有愛好人文修養的朋友共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也希望能夠教學相長，開創中國文化的未來。

鄭培凱

2002年11月1日



## 趙豐的絲綢之路——序《錦程》

認識趙豐有十多年了，還記得初見時，他大概三十歲出頭，俊朗颯爽，說話的口氣有點急切，有一種青年學者對學術追求的激動。說起他的專業中國絲綢史，特別是絲綢之路上出土的古代絲綢，臉上隱隱發出紅暈，就像沉迷於球賽的球迷，說到自己擁戴的球隊，在上一季的錦標賽中，是如何從後場一個長傳，展開了扣人心弦的攻勢，經過連番閃避，最後在幾乎是不可能的角度射進了球門。他給我的深刻印象，是對學術的熱情與執着，談起絲綢就像說到自己的情人，臉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輝。於是，我就陸陸續續請他來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前後提供了十多個講座，給香港的大學生講解中國絲綢的歷史，敘述中國絲綢是如何作為物質文明的載體，傳佈到世界各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展，改善人們生活的物質條件。

趙豐從小在絲綢製造業的環境中成長，父母都是絲綢廠的技術人員，上大學主修絲綢工業技術，又轉而研究中國絲綢史，是兼具絲綢工藝專業知識及物質文明史的專家。在研究文化史的圈子裏，這種兼通科技工藝與歷史文化的學者，是極為少有的。我還記得，曾參觀他策劃設計的絲綢博物館，他跟我講解繅絲、紡絲、織綢的過程，講如何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復原古代織機的構想。還一一為我解釋綢、緞、錦、綾的細緻差別，關鍵在於絲織工藝的複雜多端的變化。有許多過去從文獻上無法得到確切解釋的絲綢知識，一直令我感到困惑，經他通過工藝實物的分析指點，終於撥雲見日，得到明確的理解。我曾請過許多絲綢之路的歷史家與考古學家，如王炳華、樊錦詩、林梅村、榮新江、齊東方等，安排各種關於絲綢之路考古

發現及東西文化交流的講座，呈現了這條大漠上駝鈴叮噠的古道，如何經歷着雨雪風沙，聯繫起古代相對隔絕的東方與西方。我請趙豐講絲綢史，更從絲織品的實物以及每件絲綢反映出的工藝，讓古代織工的心血與智慧，通過具體的歷史細節，重新浮現在我們眼前，使我們更清楚理解每一片在沙漠中發現的絲綢，其中承載了多少文明的累積。

趙豐把他在中國文化中心的講稿，整理成書，題作《錦程》，不僅是展示了絲綢之路的錦繡途程，也顯示了學術研究的錦繡前程。書中講到中國絲綢起源時期，因為是貴重珍稀的物品，最先是與祭祀與生死觀念相關，作為喪服、祭服及祭品。其中反映了原始人對死後世界的想像與期望，觀察到蠶化為蛹，再由蠶蛹化蛾飛升的轉化過程，從中推想自然大化的歷程，以為這是從生到死，再由死轉化飛升的途徑。而蠶絲的重要作用，就理解為包裹死去蠶蛹的神奇衣裳，有一種還魂回生的神力，可以讓僵死的蠶蛹化為翩翩升空的飛蛾。因此，人死了也要穿上費盡心血織就的珍貴絲綢，作為靈魂飛升的導引，讓亡者可以登抵上界。這個絲綢起源的解釋，配合早期文獻對蠶蛹轉化的敘述，提供了古神話學的研究思路，解釋遠古時期為什麼人們不憚其煩，創造發明出如此繁複精密的絲綢工藝程序。

趙豐的絲綢史研究，引用了大量考古發現的絲綢，對過去考古工作中難以處理的絲織品進行詳細探究，補充了絲綢之路研究的「絲綢」部分。由於涉及紡織工藝，他也探討出土的毛織品、麻織品，以及刺繡工藝，全面描繪人類生活最基本的「衣」的歷史進程。他從草原文明的庫爾干文化遺址的發現，講到漢晉時期墓葬出土的絲綢，再講到西方紋飾對中國絲綢設計的影響，還講到西域中亞地區的絲綢製品，更詳細討論了唐代絲綢的輝煌成就。對於唐代以後絲綢文化如何影響日本，如

何在塞北的遼金王朝也得以發展，如何因女真與蒙古的崛起而影響高麗，因蒙古帝國的拓展而與波斯在絲織技術上有所交流，一直到明清時期西洋錦的傳入，趙豐都在書中做了詳細的敘述。

這是一部優秀的人類文明史，我樂於為之作序。

鄭培凱

## 作者序

錦繡前程，一直是人們對美好前途的一種嚮往。而我實是三生有幸，一路走來，錦繡相伴。

我的家鄉是浙江海寧的長安鎮，長安雖小，卻是京杭大運河和滬杭鐵路線上出杭之後的第一處交通要道。杭州的上塘河一直通到這裏，水面開始改變它的高低，於是就有了長安堰和長安壩，據說這長安堰和長安壩的原理，竟然和都江堰及葛洲壩相似，由此還建起了上、中、下三閘。下閘旁邊，就是曾經為浙江最大的縲絲廠——當年稱為浙江製絲一廠。絲廠是這個小鎮的重心，鎮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和這個絲廠有關。我媽媽是這個廠裏從事日夜兩班的縲絲女工，由於技術比較好，後來做到縲絲的老師。爸爸則是廠裏的機械工人，經常為廠裏的機器折騰些小革新小發明。我在廠裏的衛生總站出生，3歲開始在廠裏的托兒所過夜，6歲開始在絲廠的子弟學校上學，放學回來就在媽媽身後的檯子上做回家作業，有時也會幫媽媽在縲絲車上索緒添緒。我們讀書的學校原由一幢天主教的小教堂改建而成，1920年代由在絲廠女工中傳教的中國神父們集資建造，從這裏經過日佔時期建成的巨大繭庫，穿過滬杭線的鐵路洋旗，就到了長安鎮上唯一一條窄窄的長街，整個小鎮就沿着運河邊的這條長街排布展開。我家從街的東橫頭又搬到西橫頭，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都不曾離開過這個縲絲業興盛的小鎮。直到1977年高中畢業，我來到絲廠北面不遠的七里亭下鄉插隊，這也是一個海寧的桑麻之鄉。半年之後，我通過了文革後的第一屆高考，進入了位於省會杭州的浙江絲綢工學院。本科畢業後又師從蠶桑絲綢界的老前輩朱新予和蔣猷龍學習絲綢

歷史，直到今天我以絲綢之路沿途出土的絲綢作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近年來，我一直在鼓吹稱為「絲路之綢」(Textiles from the Silk Road) 的研究合作項目。所以，我所走過來的路，確是一條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錦繡之程，這足以令我迷戀一生。由於絲織品有機物對保存環境的特殊要求，古代絲綢總是在中國的大西北地區出土，從而引我一輩子都與西出陽關的沿途結緣。記得第一次去西北是在1985年的夏天，那是一次背包旅行。第一次接受寫作《中國絲綢史》魏唐部分的重任，我隻身一人登車西行。近兩個月的行程，到西安，出開遠門，經蘭州，又去西寧，再沿河西走廊赴嘉峪關，直到敦煌。參觀莫高窟之後便是新疆，三山夾兩盆的新疆實在是過於遼闊，我無法在一次內完成所有的考察，只能在烏魯木齊和吐魯番逗留之後就踏上歸途。歸途上又一次前去西寧尋找研究青海都蘭絲織品的機會，雖然我的停留被車遇竊賊而被迫中止，但我和考古所的隔年之約已經啟動。後一次重要的新疆之行是1989年為籌建中的絲綢博物館徵集文物，足跡到達和田和喀什。再後一次更為重要的新疆之行是2006年作為副隊長與東華大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起進行的環塔克拉瑪干絲綢之路服飾文化考察，持劍出天山，劍繞大漠還。風雪過焉耆，明月宿樓蘭。於闐觀錦繡，龜茲訪伽藍。一月三千里，聖誕猶未返。從頭算來，1985年以來我赴新疆平均不下每年一次，直到2011年，我們在新疆博物館建成我們紡織品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的新疆工作站，我又算是在絲綢之路沿途有真正自己的據點。

這二十多年幾乎就是我的整個學術生涯。期間我還十多次去過塞北內蒙的草原絲綢之路，去過跨越歐亞大陸的一些絲綢之路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如俄羅斯、日本、韓國、烏茲別克、印度等，去過收藏或展示大量絲路之綢的博物館和研究機

構。從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絲如金時》和《走向盛唐》展覽，到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的中亞絲綢之路的世紀學術年會，從大英博物館、V&A博物館、吉美博物館、聖彼德堡愛米塔什博物館等地觀摩敦煌織物直到產生《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最為令人難忘的還是2006年和2008年在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的兩次旅行，以及在亞美尼亞葉里溫的意外逗留。在昭武九姓的故地，在布哈拉和撒瑪爾罕之間，我懷揣James Elroy Flecker的小詩*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一路走來，風餐露宿。

欲從未知求真知，故縱金旅下康城。

For lust of knowing what should not be known

We make 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

我於是一直在絲綢之路上行走，在錦繡之程中徘徊，直到今天，當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邀請我舉行關於中國絲綢和絲綢之路的系列講座。

與中國文化中心的合作始於1998年我從歐美遊學回來途經香港時，我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作《從考古發掘看中國絲綢藝術的發展》的講座上結識了鄭培凱教授。此後，鄭教授就開始邀請我來城大講學，每一次的內容都離不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先是2003年10月的講座，一共講了三講，題目分別是《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禮儀制度中的絲綢》和《絲綢之路上的絲綢》。2006年2月，配合《走向盛唐》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展出，我又在香港城市大學作了《樓蘭紡織品的發現與研究》和《吐魯番紡織品的發現與研究》兩個講座。在2009年7月和2010年7月，我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分兩次比較系統地作了12次講座，整個系列講座的主題就是《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把中國絲綢的發展、藝術、工藝等通過絲綢之路的變化講出來。最後，我選擇了第一次的第1講《絲綢起源的文化契

機》和最後的第12講編在一起，形成了這本集子一起出版。書名既是對我的學術旅程的概括，也是對我的學術領域的描述：《錦程》，一路絲綢，遍地錦繡。

十分感謝中國文化中心的各位老師和同事在我數次講學過程中的指點和幫忙，首先當然是鄭培凱教授，但此外還有中心的主任助理馬家輝博士、屈大成博士、馮翠霞小姐、李桂芳小姐等，特別是城市大學的老校長張信剛、周敏敏夫婦也給予了很多的關心。出版社的陳明慧小姐也提供了大量的編輯和幫助。

在整理書稿的過程中，我的學生蔡欣根據我的幻燈片和錄音資料為我初步錄入了12講的文字稿，為我編輯此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後來在文物照片和圖片的資料整理中還得到了所有收藏單位的大力支持，特別是來自絲綢之路沿途的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內蒙等地的文博單位，以及國外收藏絲綢之路沿途絲綢文物的大英博物館、吉美博物館、愛米塔什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阿貝格基金會等，一些私人藏家也慷慨地提供了允諾使用他們的藏品。本人所就職的中國絲綢博物館更是提供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的同事們以及學生們包括薛雁、徐錚等也提供了各種幫助，在此一併感謝！

趙豐

2012年3月29日於杭州凍綠齋

## 作者簡介

趙豐（1961-），博士、研究員、教授。現任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中國紡織品鑒定保護中心主任、上海東華大學博士生導師、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國際古代紡織品研究中心理事。1982年春畢業於浙江絲綢工學院獲工學學士，1984年畢業於同一學院獲工學碩士並留校工作。1991年調入中國絲綢博物館，歷任副館長、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其中1995-97年在中國紡織大學學習獲工學博士學位、1997-98年獲Sylvan and Pamela Coleman基金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進行客座研究、1999年獲Veronika Gervers Memorial基金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進行客座研究、2006年獲英國學術院資助在大英博物館進行客座研究。2007年獲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先進個人、2008年獲評為文化部優秀專家、2010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1年獲浙江省特級專家稱號。曾任第十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委，現任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從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的30餘年研究過程中，主持了《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紡織品保護的技術規範研究》和《東周紡織織造技術研究》等國家和省部級課題，其中後者獲2009年度文化遺產保護科技創新獎二等獎。出版著作有《絲綢藝術史》、《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織繡珍品：圖說中國絲綢藝術史》、《遼代絲綢》；主編《中國絲綢通史》（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和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敦煌絲綢藝術全集》



（獲「十二五」國家出版基金）、《中華錦繡》叢書等，在國內外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中英文論文上百篇；應邀為國內十多個省的考古所、博物館及國外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等分析鑒定歷代紡織文物數千件。